

论林氏刊物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影响*

俞王毛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江西农业大学 南昌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林氏刊物的编辑理念和文学观念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古今》、《天地》等刊对林氏刊物各有借鉴。凭借对林氏刊物资源的利用,上海沦陷时期散文获得了一块弥足珍贵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林氏刊物;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1-0043-04

19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份小品文半月刊,它们刮起了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旋风,成为论语派形成的基石和发展的阵地。林氏刊物不独在三十年代有推动风潮、形成流派的重要意义,其编辑理念和文学成就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文学的面貌,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更是深刻而广泛地接受了林氏刊物的影响。

一

三十年代,我国期刊市场一度十分繁荣,仅上海一地就有期刊数百种,其中尤以小品文刊物为多,1934、1935年因此被称为杂志年、小品文年。在杂志年中,引领潮流的是林氏刊物。当时,许多刊物旋生旋灭,林氏刊物却能长时期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因文学和商业的双重成功而备受关注。林氏刊物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疏离政治、重视趣味以及对上海杂志市场的精准把握。

1927年北伐的成功结束了南北长期的分权而治局面,国民党的“党治”、“训政”时代随之开始。随着严密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宣传品审查标准》等一系列旨在钳制思想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在删改违碍文章、查禁革命书刊、迫害进步文化人士的种种措施中,国家机器不断强化其社会控制力度,统治者“体制化”知识阶级的意图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愿与政府合作的文人面临着政治立场的选择问题。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选择了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论语》“不反革命”的立场表白^①、《人间世》“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投稿规约^②、《宇宙风》“畅谈人生”的宗旨声明^③都表明了林氏刊物的政治立场和内容取舍。林氏刊物上少有政治宏文,而多文化散文、历史散文、游记、传记、日记,这些文章往往从广义的文化

角度切入,对政治、法律、教育、历史、艺术、宗教以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审美观照。借着疏离政治的策略,林氏刊物得以在日益逼仄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并获得发展。

林氏刊物的文学观念有许多独特之处,其作品在语言、风格、情味和表现对象等方面都别具一格,极具趣味性和可读性,给当时的散文创作加入了营养和灵气。林语堂等人在刊物上大力提倡幽默、性灵、闲适文学观。在他们的论述中,幽默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是对人情物理的洞达与超脱,与此同时,幽默又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体现在文学写作中,便形成一种轻松睿智、洒脱率真的风格辞采;性灵、闲适主要表现为个性的张扬和心灵的解放,从文学创作上来说,就是要从心所欲,率真为文。林语堂还提倡通俗近情的西洋杂志文。他认为,要使杂志贴近人生,就要学习西洋杂志文的写法。《论语》诸刊经常刊登译自西方杂志的文章,《人间世》前十几期设有“译从”栏,该栏的主要任务是译介外国文字,从第十五期起,改“译从”为“西洋杂志文”,专登翻译的西洋杂志文,又设“特写”栏,刊登内容和风格类似于西洋杂志文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三十年代,上海书刊业得到极大发展,出版发行机构之间的竞争也趋于激烈。林氏刊物在此环境中能够脱颖而出,与其先进的编辑理念和对读书市场的精准把握是分不开的。林氏刊物的编辑理念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们重视独特个性的打造,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得标新立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活力树立了散文刊物的新形象。其次,林氏刊物在用稿上取兼容并包方针,既凭借现代名家的作品维持刊物高雅的品位,又对不同流派的作家和文学新人开放门户,使刊物内容显得丰富多彩。此外,林氏刊物稿酬优厚,售价低廉,出刊

收稿日期:2013-01-13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2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论语派研究”(CXLX12_0363)。

作者简介:俞王毛(1973-),女,江西武宁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及时,重视编读互动,赢得作者、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这些举措体现了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亦获得读书市场的丰厚回报。当时不少刊物因经费困难而难以为继,林氏刊物却拥有可观的市场份额:《论语》的销量一度达到五万份,《宇宙风》问世不久,销量就上升到四万五千份,在当年的期刊界位居第三,《人间世》也期期畅销。诚如论者所言,林语堂“有意无意地触动了上海杂志文化市场的一个关键性按钮”^[4]。良好销售业绩为林氏刊物带来巨大声誉,更为刊物的良性运转创造了物质条件。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大部分刊物相继停刊,林氏刊物有的停办,有的迁出上海,但是,它们的编辑经验和文学观念已经沉淀下来,成为影响日后文学面貌的重要资源。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沦陷时期文学和战后文学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林氏刊物的烙印,其中沦陷时期的散文与林氏刊物的传承关系尤为明显。

与三十年代相比,沦陷时期的文学环境更加逼仄,日本占领当局和汪伪政府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统治,制定系列新闻出版法规,加强新闻出版检查的力度,控制电台、电影、报刊等媒体,拘捕、迫害抗日爱国文化人士,清剿、禁止抗日书籍。此种政治形势使沦陷区作家“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5]。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对作家的写作形成了极大制约。此时,民族、国家等都是敏感的话题,抗日救国等题材内容则成了文学的禁区,汪伪政府提倡的“和平文学”也难以获得作家们心甘情愿的拥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文人寻求着切实可行的文学样式。他们中有不少人和林语堂一起走过《论语》时代,当年大获成功的林氏刊物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效法的榜样。在短短的数年间,上海沦陷区创办了《古今》、《风雨谈》、《天地》等多种散文期刊,借着它们的传播,曾在林氏刊物上占重要地位的散文小品又在沦陷区文坛兴盛起来。这些期刊在编辑理念、文学选择、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与林氏刊物有极深的关系。从编辑理念来看,它们以不谈政治相标榜,以小品随笔为中心,其自我定位和精神实质与林氏刊物十分接近;从文学选择来看,它们以生活散文、文化散文、历史散文为主,注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与林氏刊物的兴趣大致相同;从人事关系上看,它们的编辑多为林氏刊物所培养,其作者多为林氏刊物的中坚力量,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许多读者之前都受过林氏刊物的熏沐。从《古今》、《天

地》二刊可以清楚地看出林氏刊物对沦陷区散文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

二

《古今》是上海沦陷后最早创办的文学期刊,创办人为朱朴,1942年3月创刊,1944年10月停刊,最初为月刊,从第9期起改为半月刊,共出57期。刊物最初由朱朴、陶亢德、周黎庵三人共同主持,从第三期起由周黎庵负责日常编务,第九期至第十八期陶亢德亦署名编辑,文载道也一度参与编辑工作。《古今》创刊号售出1500份,至周年纪念号时销量近4000份,这在沦陷区算是不错的成绩。

《古今》对政治采取完全规避的态度。朱朴时任汪伪政府官员,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伪政府首脑过从甚密,《古今》上发表过他们的不少文章,这一点使《古今》一直为人诟病。事实上,《古今》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份官办期刊。朱朴曾经谈起《古今》创办的缘由和方式:因迭遭家难,办刊物以遣愁寄情,“梨枣之资,均出私家;涓滴之微,未由公府”^[6],《古今》“完全是一个私人的刊物,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由意志的刊物”^[7]。在沦陷区环境中,“百分之百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样的创办背景至少给了《古今》同人不谈政治的自由。汪伪政要也大多以文人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古今》上,“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借政治力量统御文坛的野心,反而意图利用后者纾解个人政治上的困境”^[8]。汪精卫等人本来就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发表于《古今》的文章充满了“他生未卜此生休”的悲凉感,殊少政治气息。

《古今》走的是感伤、怀旧的小品文及历史掌故路线,格调高雅,内容以人物志和史实钩沉为主。人物志包括名人逸事、人物品评、名人传记等。经堂(陶亢德)的《记蔡子民先生》以其亲身感受,讲述了蔡元培的人品及成就,其评价之词至今为人称引。柳雨生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记叙真实生动,特别是陈独秀狱中表现及律师辩护等事,叙述细致而客观,一直是陈独秀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郑秉珊《近代书人》分析郑孝胥、罗振玉、沈从文、于右任等近现代十数人的书法艺术,判断各人的师承关系、书法造诣及影响,资料翔实,持论公允,自成一言之言。《古今》聚集了徐一士、瞿兑之、冒鹤亭、周黎庵、文载道等掌故大家,因而所载历史掌故极多,且有很高的水准。徐一士、瞿兑之合著的《掌故问答》、文载道的《清宫掌故》、周黎庵的《中国明清的官》等文,既是专业的学术文章,又不失随笔亲切闲谈的风致,极受读者欢迎。总的看来,《古今》上的

文章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思想交流和知识传播上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彼时彼地散文成就的代表。

《古今》上林氏刊物的影响清晰可辨。陶亢德编辑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乙刊》,他主持《古今》时自然会驾轻就熟地将林氏刊物的那一套编辑理念和方法移用到《古今》上来。周黎庵也是论语派作家,在林氏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他还参与编辑过《宇宙风乙刊》及《宇宙风》的同系刊物《谈风》,因此,在编辑《古今》的过程中会自觉地向林氏刊物吸取经验。翻阅《古今》,可以发现它极大地继承了林氏刊物古雅的一面,在立场、内容、风格、甚至封面设计等方面都可以发现模仿和借鉴的痕迹。因周、陶与林氏刊物的关系,《古今》成为沦陷区的论语派作家相聚的平台,周作人、陶亢德、周黎庵、苏青、谢兴尧、柳雨生、文载道、朱朴等《古今》的重要撰稿人都曾是林氏刊物的作家,尽管受到沦陷区创作环境的严重制约,他们当年养成的文学习性还是顽强地表现在《古今》上。编者和作者对昔日文学活动的记忆使《古今》打上了林氏刊物的深深印痕。正因如此,时人在论及《古今》时,总是自然地将它与林氏刊物联系在一起。如郑秉珊认为,“现在《古今》的风格,与战前《宇宙风》最相似,偏重随笔小品,也不废文史掌故”^[9]。纪果庵则说,他对《古今》“略加披览,始大欣悦,好像又回到六七年前看《宇宙风》的心情”^[10]。

三

与《古今》的古雅持重不同,冯和仪主编的《天地》显得活泼浅俗。《天地》为月刊,1943年10月创刊,1945年6月停刊,共出21期。《天地》创刊号售出五千份,此后也维持着较高的销量。

《天地》的编辑策略与《古今》相似,都以刊登散文小品为主,主要撰稿人也与《古今》多有重合。不过,与《古今》侧重文史、重古轻今的倾向不同,《天地》更注重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天地》的发刊词指出:“散文可以叙述,可以议论,可以夹叙夹议;文体严肃亦可,活泼亦可,但希望严肃勿失之呆板,活泼勿流于油腔滑调而已。……只求大家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之不厌。”^[11]这段话与《宇宙风》的《且说本刊》在旨趣上十分接近,说《天地》有意接续林氏刊物的流脉当不为过。

《天地》设有“谈天说地”、“读书随笔”、“人物志”、“地方志”、“风俗志”、“掌故”、“杂考”、“小说”、“生活特写”、“通讯”、“欢天喜地”等栏目,除“小说”

栏外,大部分是散文小品。其中“谈天说地”栏发表随感录式的杂感,内容大都是温和的文化批评;“人物志”栏对近现代名人如王国维、赛金花、小凤仙、曾国藩等多有述写,对周作人、陶亢德、林语堂、予且等原林氏刊物的作家更有一种经久的兴趣,有许多文章是对他们的记述和评议,如谭惟翰的《记予且》(创刊号)、郑文的《知堂谈阿Q》(第2期)、实斋的《闲话陶亢德》(第4期)、《论林语堂》(上,下)(第11、12期),等等,借着此类文章,《天地》表达了对这些小品文前辈的敬意,也表明了自身与林氏刊物的密切关联。像林氏刊物那样,《天地》也提倡向西洋杂志文学习,以通俗清新的文字表达切实的人生观感。

《天地》主编冯和仪与林氏刊物的渊源亦甚深。陶亢德曾以前辈的身份对她表示:“我说实斋与你,是从论语到宇宙风这一时期中的新人双璧,就使那两个东西不过是灾梨祸枣的东西罢,但因此东西而促成了两位天生写作者的执笔,已经是对得起纸张油墨的事了。”^[12]冯和仪正是在林语堂和陶亢德的培养下成为林氏刊物的重要作家的。陶亢德是发现她才华、编发她第一篇文章的人。多年以后,她曾回忆这段往事:“有一天,我忽然技痒起来,写了一篇《产女》投稿到论语,很快的就被录用了,不过题目已由编者改为《生男育女》,这是我正式写文章的开始,那篇文章登在第六十四期的《论语》上。”^[13](按,作者此处当为误记,该文标题实为《生男与育女》,发表于第67期《论语》。)不久,她又以《科学育儿经验谈》投稿《宇宙风》,林语堂将它发表在《宇宙风》第1期,在此期《编辑后记》中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称它为“切近人生类似西洋杂志的文章”,并请作者为《宇宙风》长期撰稿。初学写作的冯和仪在他们的鼓励下,循着这样的文学道路走了下去,此后在《宇宙风》、《逸经》、《宇宙风乙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逐渐形成浅俗自然的散文风格。冯和仪的这种文学经历自会使她在编辑《天地》向林氏刊物靠拢,使《天地》带上浓厚的林氏刊物色彩。

四

从以上对《古今》、《天地》二刊的分析可以看出,林氏刊物对沦陷区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们不仅在栏目设置、内容编排、刊物风格以至刊物名称等方面为沦陷区期刊提供借镜,更在办刊理念和文学思想方面为其指明方向。林语堂和他的刊物也因此成为沦陷区散文界的一面旗帜,具有聚合文人、引领文风的作用。沦陷区杂志界对林语堂和

林氏刊物的推重之比比皆是。《古今》如此介绍苏青：“《送礼》作者苏青女士，自《谈离婚》一文在本刊发表后，博得好评极多。女士固一老作家，以写人生琐事为林语堂氏所激赏，七八年前即蜚声文坛，此后当为本刊长期执笔。”^[14]谢兴尧则将林语堂数年前为《逸经》写的《与又文先生论逸经》转赠给《古今》，并评价道：“语堂先生的言论，都是可贵的礼物，也可说是一般文史刊物应该注意的事。”^[15]一庵对林氏刊物的故人故事津津乐道：“民国二十一年林语堂创办《论语》于上海，提倡幽默文学，一举成名，由此幽默大师的徽号，传遍中外。按林氏重在技艺，四五年间，造就不少知名当世之人物，女作家姚颖，便是其中的一位。”^[16]尽管其时林语堂身居美国，正借创作和演讲等活动倡言抗日，与身处沦陷区且与汪伪政权关系暧昧的陶亢德、周黎庵、朱朴等人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这并不妨碍沦陷区文坛将林语堂此前的相关言论奉为圭臬，自觉地向林氏刊物吸取经验。

当然，我们在承认沦陷区的文学生产借鉴了林氏刊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沦陷时期的文学环境较三十年代发生了极大变化，沦陷区文学与林氏刊物在面貌接近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论，林氏刊物疏

离政治的口号与其说是畏惧权势，毋宁说是一种争取话语空间的策略，刊物中对政治的尖锐批评和恳切建言所在多有，沦陷区文学处于更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对政治问题的谈论更加隐晦曲折，对于时局动荡、民生多艰的现实，也只能作出温和的批评，无法畅所欲言。以散文的风格而论，林氏刊物多幽默潇洒之作，沦陷区文学则显得沉重忧伤。总的说来，与林氏刊物上的文章相比，沦陷区文学少了一种自信与风骨，多了一份乱世的无奈与茫然。但是，这些文章较多地继承了林氏刊物的文学精神，它们大多出自真情，文化意味浓厚，文笔清新流畅，对沦陷区的文化留存和文学创作有着无法替代的贡献。

结语

林氏刊物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们本身的思想内容、风格特征固然值得细加研究，它们在文学发展链条上的地位也值得重视。林氏刊物以其可观的成就影响了同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正是凭借对林氏刊物的资源利用和经验传承，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获得了一块弥足珍贵的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林氏刊物的良好示范作用以及它们培养出来的编辑、作者和读者，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面貌将大为不同。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论语社同人戒条[J].论语,1933,15.
- [2]人间世投稿规约[J].人间世,1934,2.
- [3]语堂.且说本刊[J].宇宙风,1935,1.
- [4]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194.
- [5]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 [6]朱朴.朱朴启事[J].古今,1943,19.
- [7]朴之.满城风雨谈古今[J].古今,1942,9.
- [8]罗久蓉.张爱玲与她的成名年代(1943—1945)[A].阅读张爱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9.
- [9]郑秉珊.《古今》一年写作一年[J].古今,1943,19.
- [10]纪果庵.古今与我[J].古今,1943,19.
- [11]发刊词[J].天地,1943,1.
- [12]陶亢德.东篱寄语[J].天地,1944,4.
- [13]女作家聚谈会[J].杂志,1944,4.
- [14]黎庵.社语·编辑后记[J].古今,1942,12.
- [15]谢兴尧.《逸经》与《古今》[J].古今,1943,19.
- [16]一庵.读论语忆姚颖[J].逸文,1945,1.转引自谢兴尧.回忆《逸经》与《逸文》[J].读书,1996,3.

On the Influence of Mr. Lin's Periodicals on Literary During the Time of Shanghai Occupied by Japanese

YU Wang-mao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下转56页)

条通往美好人性和精神天堂的道路,也是我们当下社会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一条道路。

虽然须一瓜笔下的三个人是需要服从法律判决的罪犯,但是他们有着高尚的精神,有着自我赎罪的品质,在恶降临的一瞬间开始了真诚的自我救赎。抓住时间的尾巴,让美好的心灵为自己救赎之路引导方向。看似是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有这样三个英雄,在用自己的生命

昭示人类,自我救赎是通往人性最美最善的道路。而在这种英雄的自我救赎的震撼中,在这样的悲剧精神的触动中,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的道路如今是否还有人虔诚地去探索,善与恶是否该暂时撇开法律的制约,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并探索发扬人性之善的方法。

救赎即道路,在须一瓜笔下的三个英雄的自我救赎不仅让我们深深思考:光阴荏苒,救赎何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须一瓜.太阳黑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 [3]谢有顺.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 [4]李敬泽.纸现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5]须一瓜.密码[M].中篇小说选刊[J].2010,2.
- [6]王春林.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尖锐追问——评须一瓜长篇小说《太阳黑子》[J].江苏:扬子江评论,2010,5.

Time Goes by but Where Is the Salvation-Looking at the Hero's self-redemption from XuYigua' Sunspots

WANG Xiao-xua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In the spirit of questioning style tragedy, good and evil is only a brief moment. Fuzzy edge of good and evil, salvation has three aspects discussing self-redemption in human nature from XuYigua' Sunspots, as well as the questioning of the social humanity roa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elf-redemption; Humanity; Edg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6页)

School of Nanchang Business,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Editing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concepts of Mr. Lin's periodical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hanghai literary during the time of Shanghai occupied by Japanese. Gu Jin, Tian Di and other periodicals all learnt from their experience. By the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Mr.Lin's periodicals, modern essay during the time of Shanghai occupied by Japanese gained a cherishing development space.

Key words: Mr.Lin's Periodicals; Shanghai Literary During the Time of Shanghai Occupied by Japanese; Influ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